

传播学视域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要素的优化策略

马玲玲^{1,2}, 郑大俊¹

(1.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8; 2. 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是一个特殊复杂的信息互动过程, 每一个动态发展的传播要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沟通实效性。立足传播要素理论对沟通要素进行审视发现, 这些要素存在教育者作为“把关人”职业素养不足、教育者把受教育者当作“信息接纳盒”、教育传播内容与受教育者价值期待存在差距、教育传播媒介作为“传声器”的失控以及教育传播反馈作为“反射镜”的海市蜃楼现象等诸多不足。有鉴于此, 有必要借助“信源可信性”观点、“意见领袖”观点、“把关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多说法”、“一面提示与两面提示”等理论与方法, 从促进教育者始终保有“先进性”、引领受教育者持有对信息理解的正确方向性、保证传播内容具备主导性、体现传播方式展示技巧性、深化受教育者在反馈中的主体性等方面寻求优化策略。

关键词:传播学; 思想政治教育; 沟通要素; 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6)06-0011-05

随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进展, 那种自上而下式单向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已经愈发受到学界的质疑,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愈益确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作为主体的地位,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领域愈益重视师生沟通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价值。随着21世纪“微”时代的到来, 大学生思想日益显著的个性化趋向以及愈发彰显的主体能动性, 使得现实工作中强调整体的、带有浓郁政治气息且狭隘封闭的沟通模式已明显不适应, 亟需探寻理性、开放、科学的传播方式。传播学是一门运用符号研究人的传播行为和社会传播现象的学问, 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则是充斥着政治价值观念色彩的特殊的传播活动。我们认为, 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研究工作而言, 应借鉴现代传播学相关理论, 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主体间沟通为切入点展开探索。

一、基于传播模式理论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解析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一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为核心内容^[1], 在强调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和阶级性的基础上动态发展。

1948年, 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这篇传播学纲领性力作中, 提出了传播学著名命题“5W”传播模式, 将传播过程分解为五个问题要素, “谁”(Who)——传播主体; “说什么”(Say What)——传播内容; “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传播媒介; “对谁说”(To Whom)——传播对象; “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传播效果^[2]。这些要素映射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过程与传播过程具有要素同构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过程也至少包含以上五种元素。这些动态性的传播过程元素的排列组合方式之变化随时引起蝴蝶效应, 呈现复杂多样的状态, 既而促发对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效果的深远影响^[3]。

第一, 传播者: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平等者中的首席^[4]。纵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过程, 教育内容的始发送者即教育者可以是个体、组织也可以是群体, 决定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方向, 把握着内容的收集选择、加工整理、传递反馈,

收稿日期: 2016-08-16

基金项目: 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指委与百度产学研合作专业综合改革项目(重点项目)(2014-B011); 2014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14SZB005); 2013年度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重点项目(GJS-XKT1302)

作者简介: 马玲玲(1982—), 女, 江苏金湖人, 讲师, 博士研究生, 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研究。

操控着内容的质量、数量和流向,掌握着传播工具和手段,像卢因提出的“把关人”那样,发挥着传播者的作用——筛选、组织、传递教育信息。由于教育者在沟通过程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和所起的主导作用,因而其自身特点会对沟通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教育者的被接受度(权威性);②教育者的动机(可靠性);③教育者的能力(专业性)。

第二,受传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受教育者——教育的归宿点。受教育者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作用对象,离开受众,就失去传播活动目标,也就没有传播的发生。受教育者既自主接收教育者传递的信息,又能动把握信息的选择和处理,并通过反馈环节影响教育者,因而具有双向回流特征。同时,受教育者自身的心理特征亦会制约着传播效果,包括:①人格心理。受教育者千差万别,如性格、信念、兴趣、需要、动机等决定了对沟通内容的选择、认知和接受;②遵从性心理。受教育者言行易受其所处群体影响,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失去正确判断的独立意识;③选择性心理。受教育者对传递过来的教育信息会采取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

第三,传播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沟通关键内核。传播内容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信息,既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现代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价值观教育和国情教育,内容丰富多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信息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信息,它具有明确的教育性,赋有一定的价值。教育者根据同期思想政治教育行为的目标以及受教育者的需求对沟通内容进行必要的组织安排。沟通信息是整个传播过程的“传播介质”,信息在沟通双方之间双向流动、共享,当双方感知到信息所传递出的表层和深层意义时,沟通需求即被满足,沟通也就有了意义。要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信息达到目标效果,需抓住两个中心:一是“说什么”,即沟通中想要表达的教育内容的选择、设计与编排;二是“怎么说”,即表达内容的沟通方法与策略,尤其强调沟通的艺术性。

第四,传播媒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依赖的新媒体——沟通中介因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信息是一个抽象物,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作为传播载体将其传播给受众人群。媒介是教育信息的“服务器”,搭建桥梁串联传播过程中的各要素。数字时代以前有四大主流传媒:报纸、广播、电视、杂志,而今已进入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成为传统四大媒介之后一个重要的传播媒介。各类媒介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不同的媒介渠道产生不同的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传播效果。不同的教育受众群体因其职业、文化程度的不同,对媒介的接触习惯也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形式上、载体上要不断地创新,根据不同的群体研究不同的形式和方法^[5],考虑特定受众接触最多、最依赖的媒介。

第五,传播反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沟通实效——沟通效果“控制器”。传播反馈是传播活动的意图和归宿,是受教育者把对传播信息的感受、评价、态度甚至行为通过某种符号送回给教育者,有助于教育者检验和证实传播效果。因此,反馈是及时反映沟通效果的“晴雨表”,是提高沟通实效的“控制器”。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互为主客体,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共生反馈。教育者贯彻“以生为本,切合实际”的理念,使受教育者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认识更加具象、更易接纳,并充分感受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中的自主性和开放性,受教育者在被尊重、被鼓励中主动促成较好的沟通效果。

二、立足传播要素理论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缺陷审视

运用传播学要素理论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效果,既能研究五大传播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动态变化,发现不足和缺陷,又能把握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活动各环节,优化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实效。

1. 教育者作为“把关人”职业素养不足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发起人和组织实施者主要为辅导员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育者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者作为“把关人”对效果的影响;二是教育者自身综合素质对效果的影响。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存在准入条件较低,不讲专业与职业要求,仅以学历、政治面貌、学生工作经历作为“一刀切”的评价标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泛职业和泛专业倾向,导致一部分从业者职业素养偏低,缺乏关心受教育者个人需要和发展的情怀,习惯于使用各类规章制度管控受教育者,导致大学生产生抵制情绪,对强制定令下的信息更带有偏见;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者虽有一定的职业理想,但墨守成规,缺乏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情况和问题的自觉意识和能力,岗后再教育匮乏,信息素养滞后,难以与当代大学生的实际教育需求接轨,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还有些思想政治教育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担负的职业使命和职责,缺乏职业认同感和追求,缺失工作激情,难以沉下心来深入大

学生群体中做工作,因此,与大学生思想交流空洞、宽泛、浅薄,使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失去应有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境况反映了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力不足“不能为”、动力不足“不想为”、担当不足“不敢为”的状况^[6],严重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实效。

2. 教育者把受教育者当作“信息接纳盒”

受教育者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接收者和反馈者,具有不同的认知结构、心理特征和倾向,决定了其对教育内容的理解、选择和转化也存在差异。同样的信息被两个人接收后或被同一个人在两种不同状态下接收,所得到的反应往往并不一致。教育者须重视个体差异性,尊重每一个受教育者的看法、观点、理解和体悟,有针对性地开展对话沟通。

目前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政理论课。教学方式沿袭单一、直接的说教方式,忽视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和差异性,使大学生缺乏应有的热情和兴趣。而应作为大学生关系最紧密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辅导员也未能真正承担起应有职能。他们往往将各类学校行政信息、要求“打包”无差异化地投向“学生客户群体”。这种传话筒般的政治宣传,毫无感情甚至带有强制色彩的相处方式使大学生十分反感,拒做教育者手中的“提线木偶”。现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工作中存在较多缺位的地方,教育者要能真正体现对受教育者现实状况的理解与尊重,寻找和善用受教育者群体中较能快速领悟教育者思想的“领军人物”发挥群体效应,扩大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实效。“传播学之父”施拉姆认为,“要使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发生重要的转变,通常就要从改变其珍视的团体的态度着手”^{[7]293}。

3. 教育传播内容与受教育者价值期待存在差距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开拓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除传统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教育外,还与时俱进创新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家国情怀教育等,不断强化时代感和针对性。内涵丰富的教育内容让大学生接受了更广泛、更深刻的精神洗礼,但繁杂的各类符号所呈现的教育信息容易使大学生对教育内容的认识模糊不清,因此需要传递给学生确定具象的沟通内容,通过内容的真实性、透彻性、契合性促成沟通信息的可接受性,并做周详的组织与考虑。同时,沟通内容的滞后性与媒介渠道的不当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偏重理论性和教育性,沟通内容大而全、假而空,缺乏说服力;表达形式单一,多限于课堂或个别谈

话,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实效难以达到受教育者的价值期待,导致内化于心与外化于行效果微弱。

4. 教育传播媒介作为“传声器”:失控

从传播的媒介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元素内嵌于校园建筑、学生活动、校内讲座、校园传媒等校园环境,使文化符号通过多种感知方式充实教育意义。通过学生社团、政治类社团、班团等组织形成的人际传播对身边同学、朋友进行隐性影响。对于新兴网络媒介,由于大学生对其占有率及巨大依赖性,越来越多的高校拥有自媒体,为学生提供从校园生活信息到科研学术等多方面的各种服务,使得这些新兴媒介极具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功能。虽然互联网有信息来源广、范围宽、发展快、易获取的优势,但由于面向大学生的传播主体比较多,而对各种传播信息进行编码的主体匮乏且编码过程复杂多变,缺少有效的守门人系统,容易造成信息过多过滥、信息被篡改、泄露和阻止,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愈发复杂和难控,传统媒介的相对有序与新兴媒介的无序矛盾凸显^[8]。

5. 教育传播反馈作为“反射镜”:海市蜃楼

反馈用以核实信息是否无障碍顺利传送或信息是否无偏差准确传送,以确认信息被接收和准确理解,是沟通过程的最后一环,具有积极作用。沟通势必求通,传而不通,再多的信息量也无用。在富有强控制力的传统单一沟通模式中缺乏互动和反馈的机制,教育者一味传递自己的思维和观念,对教育对象能否理解与接受其传递信息置若罔闻,呈现出教育者的“独白”与教育对象的“缄默”相互容忍,对反馈这一“对话”工具束之高阁。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独白性特征”,体现在教学理念、思维逻辑上的“独白”性,教科书和教学模式的“独白”性以及教学理论与实践关系上的“独白”。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独白”性特征是传统封闭社会的产物,是“权力宰制理性”的反映,是政治“总体性”社会的必然结果^[9]。传统教育的“独白”特质将教育工具化,而非生活化,即韦伯所述“意义的丧失”,使思想政治教育沟通重“沟”轻“通”,引发一系列“非对称性沟通”。

三、依凭传播学理论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要素优化策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过程兼容了传播的基本要素及运行的基本环节,为进一步探究、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效果建立了基础。面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要素的前述缺陷,务须借助于传播学相关理论探寻要素优化的策略,以期实现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沟通实效性的再提升。

1. “信源可信性”观点促进教育者始终保有“先进性”

古代先哲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出传播者的三个评价维度:知识和正确性即传播者的专业权威性、可靠和诚实程度即传播者的信誉、意图即传播者的传播动机。在近代,著名传播学者霍夫兰经过实证研究提出“可信性效果”的概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中,教育者的可信性取决于外界赋予教育者的身份、资历和荣誉等客观因素,也取决于教育者自身所具备的人格、道德、能力等主观因素。教育者的可信性越高就越容易符合受教育者的心理期待,从而将对教育者信赖、认同的积极情感泛化到其所传播的教育信息上,不同的教育者传播同样的信息就有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要提高“信源的可信度”,首先,要提升教育传播者的专业学术水平,塑造出专家学者型传播者,以渊博的学识感染学生,指导学生;其次,要增强教育传播者的信誉、提升人格魅力,使大学生对老师产生道德认同和情感依附;再次,要端正教育传播者的传播动机,拉近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间的心理距离;最后,要提升教育传播者的传播技术和能力,扩大传播影响力并引导受教育者主动参与传播。在现代信息社会,无论是在线下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场域,还是线上网络社交平台,教育者都要维护其信源可信的一致性、稳定性和持久性,以避免或推迟传播中“休眠效果”现象的发生。

2. “意见领袖”观点引领受教育者对信息理解的正确方向性

沟通信息并非如传播学“子弹论”描述的那般有如子弹一样射向公众,使公众闻声而倒。真正使信息有效、有力传达,需要争取具有传播和影响的中继和过滤功能的“意见领袖”的支持,他们虽不是选举产生且无实际头衔,但其在受众群体中的活动力、影响力引领和决定着传播基本导向^[10]。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自身的说服力,必须注重观察、发现、引导和培养学生群体中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意见领袖,重视其对教育对象的信息传递,发挥他们在传播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关注他们的思想和言行,避免其负面效应的产生。

首先,以培养校园场域中大学生“意见领袖”为主。高校学生众多,而专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配备有限,教育者的思想、理念不能迅速、准确、有效地传播给广大学生,因此,要注重培养各级各类的学生干部,特别是有着正面性“意见领袖”意识的有志青年。他们通常具有反应迅速、见解个性、言辞犀利、

表现活跃等特点,在大学生各类交际圈中通过一定时间的相处、积累自然产生,作为大学生自发学习的精神领袖受到圈中同学的广泛认可和支持。这些“意见领袖”比其他同学更易于接受、领悟教育者传达的信息、精神,经过“意见领袖”这个重要枢纽进行人际传播和意见精神的转化后能起到比较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教育者要在发现“意见领袖”的基础上,及时、充分地引导、培养、运用“意见领袖”。

其次,以培养网络媒体中大学生“意见领袖”为辅。作为新媒介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社会特殊人群,大学生习惯并擅长于从网络媒体获取学习、生活、娱乐等信息,他们捕获信息快速、敏锐,既有前沿性又有交叉性,成为新媒体的生力军。校园场域中的“意见领袖”具有一定的局域性,形成的权威和发挥的作用受到一定的局限,不等同于网络场域中的领军人物。高校中一部分大学生在网络社区相当活跃,在学生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是网络中大学生“意见领袖”的培育对象。但由于网络媒介中大学生群体匿于“马甲”下的隐蔽性,使我们不易发现那些把控网络话语权、享有较高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因此,教育者要深入网络媒体,积极参与虚拟世界中受教育者关注的社区和领域,发现、争取并引导网络媒体中的大学生“意见领袖”,必要时安排专人组建一批“网络评论员”,使他们在大学生聚集的社交网络中发挥更加正向和积极的传播效应,成为主导高校大学生进步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思想言论的中坚力量。

3. “议程设置”理论保证传播内容的主导性

“议程设置”理论基本核心思想在于,媒介的报道内容,指挥受众的关注内容;媒介大力宣传什么,引导受众愈加关心什么;媒介分不同次序、不同程度的报道,就影响受众对议题重要性的判断。按照“议程设置”思路,教育者可对某一特定内容采取显著且持续性的报道,引导受教育者将注意力转移至这一特定内容上,这是议程设置的第一步——问题议程设置。其次,教育者通过对这一特定内容有选择、有倾向、有控制的宣传,影响受教育者对这一特定内容的认识,这是议程设置的第二步——属性议程设置。教育者通过以上两个步骤的作用,决定受教育者想什么,并左右舆论的形成。

“议程设置”理论体现了大众媒介的一个重要功能,教育者可在重视和尊重受教育者的差异性和利益需要的前提下,结合课本与时政热点按其重要程度甄选议题,编排教育内容,对受教者的关注热点实施有效的转移,增强现实性的同时弥补国内统编教材的不足;同时借助现代化新闻传播平台如校园

微信公众号或者微博,有选择、有倾向性地向受教育者推送富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党的先进性等内容的网络文化产品。借助线上线下双重媒介渠道的渗透融合,形成全方位一体化的教育传播合力,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内容有力渗透,增强传播实效。因此,教育者要不断深入受教群体,弄清他们关注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从中提取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通过该内容选择权重、反复强化、等级划分和顺序排列的差异化传播设置与编排,启发和引导受教育者对该内容的感知层次、重视程度以及内容本身重要性顺序做出判断,从而借助“特定内容”的传播对受教育者实施“既定的影响”。

4. “多说法”、“一面提示与两面提示”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技巧性

由于网络平台缺乏守门人系统,造成信息无法被过滤筛选,带来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中的障碍,教育者为使信息有效传达,会策略性选用传播技巧。通常采用较多的是“多说法”,向接受者不厌其烦、反复传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使其在轰炸式信息压力下,避免或减弱其他信息源影响,从而逐步感化至改变初衷,施行教育者所期望的行为举措。在此情况下,教育者定期与不定期反复传播,以加强巩固前期传播实效。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可在不同情况下通过对沟通内容的组织,增强沟通实效。一种是“一面提示”:教育者只讲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观点、证据和事实;另一种是“两面提示”:教育者同时也介绍对立方的观点,罗列不利于自己的素材。“一面提示”观点集中,避免相反信息干扰,但容易造成专制与强加于人的感觉,一旦教育对象察觉其他信息,易引起误会以致降低对教育者及其信息的可信度。“两面提示”通过两种观点全面对比,使教育对象自己分析总结,避免其逆反心理,但易产生反作用,使教育对象站到对立面。因此,两种方法的使用一定要根据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的教育内容而定,尤其在现代各类传播媒介全面渗透受教育者学习生活情况下,更要谨慎使用“一面提示”,以避免产生负面效果。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过程中,教育者还可以通过情理交融法、正反认证法以及结论两分法等来产生共振效应,实现教育沟通目的,获得目标传播效果。

5. 从旁观到参与,深化受教育者在反馈中的主体性

传播是一种收发主体双向互动行为,反馈是接收者能动性的重要体现,正是反馈的存在映射出传播过程的双向性和互动性,这是一个完整的传播过

程不可或缺的元素^{[7]65}。思想政治教育在强目的性和教育性的驱使下,力求解决现实或潜在的问题,若只局限于教育者的信息输入,而无受教育者反馈输出,则无法确认和纠正有可能出现的偏差,因此,教育者要争取创造一切可能的机会吸纳反馈,通过访谈、调查、网络等形式让受教育者有参与、介入、在场的途径,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过程是教育主客体之间的相遇过程,教育中不允许有旁观者,上下同欲者胜,我们需要集合全体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参与共同体为提高教育效果提供全面多源的信息和可靠的依据,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更加有的放矢地开展。

反馈的过程就是受教育者重新再认识的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效果的反射镜,对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调控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对话”式教育通过“商谈”,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从沟通双方各自的前理解结构出发而达成一种共通感、促成视界融合、提升理解能力,达到意义的生成。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重中之重是使受教育者愿意坦诚、真实地面对教育者,共同建立一个平等、互敬、理解、共通的思想教育对话平台。在此基础上,受教育者才能帮助教育者修正、完善沟通内容、方法、途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传播的进程和效果。

参考文献:

- [1] 鲁杰.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设立的必要性及构想[J].思想教育研究,2011(5):12-15.
- [2] 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35.
- [3] 元林.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传播性因素及对策[J].社会科学家,2010(10):127-132.
- [4] 小威廉姆·多尔.后现代课程观[M].王红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38.
- [5] 高宇彤.思想政治工作应重新定位[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7(1):84-86.
- [6] 新华网.用新状态贯彻落实新理念[DB/OL].[2016-01-23].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23/c_1117871316.htm.
- [7] 成振珂.传播学十二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
- [8] 谢加书,李怡.传播学视野中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若干变化及对策[J].思想教育研究,2008(9):23-26.
- [9] 金林南.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视域的反思与建构[J].思想教育研究,2009(3):27-31.
- [10] 胡正荣.传播学总论[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209.

(责任编辑:许宇鹏)